

引用格式: 司瑞石, 周石磊, 刘明月. 农村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的影响及其机制[J]. 资源科学, 2023, 45(4): 857-871. [Si R S, Zhou S L, Liu M Y.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rur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on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tension of transfer-out households[J].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4): 857-871.] DOI: 10.18402/resci.2023.04.14

# 农村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的影响及其机制

司瑞石<sup>1</sup>, 周石磊<sup>1</sup>, 刘明月<sup>2</sup>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西安 710055;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  
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目的】促进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是增强地权期限稳定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根本前提。新就业形态下转出户非农就业稳定性受到严峻挑战, 进而影响其农地流转续约达成。然而, 现有研究尚未关注非农就业稳定性与农地流转续约之间的因果效应及其影响机制。【方法】本文基于陕西和甘肃2省516户农地转出户数据, 从非农就业时间、非农收入占比、非农就业满意度3个层面刻画并测度非农就业稳定性, 并采用IV-Heckman模型和中介效应法实证分析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①样本区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稳定性均值为3.016, 58.72%的转出户愿意流转续约, 平均流转续约期限为3.752年。②在克服非农就业稳定性测量误差和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问题以及续约意愿产生的样本选择问题后, 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并且这一结果具有良好稳健性。③机制分析表明, 非农就业稳定性通过人口吸附效应和生计风险感知同时影响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 通过转出收益预期仅影响农地流转续约意愿。【结论】本文提出了增强企业非农就业吸纳能力、提高转出户非农就业技能、加强非农就业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强农地流转续约全链条管理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就业形态; 转出户; 非农就业稳定性; 农地流转续约; IV-Heckman模型; 中介效应法; 陕西; 甘肃

DOI: 10.18402/resci.2023.04.14

## 1 引言

以集中连片、机械替代和技术集约为特征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趋向, 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作出新时期、新阶段重要战略部署。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55亿亩<sup>①</sup>, 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超过40%<sup>②</sup>。为此,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再延长的背景下, 如何保证地权稳定性, 尤其是地权期限稳定, 着力提高农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成为顺应国情、农情, 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变农业大国为农业强国的重要命题。

学术界关于农地地权稳定性的研究主要包括

收稿日期: 2022-12-11 修订日期: 2023-03-2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10316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2批面上项目(2022M721733);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2021D008)。

作者简介: 司瑞石, 男, 河北承德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生态环境与公共健康治理研究。E-mail: siruishi@126.com

通讯作者: 刘明月, 女, 河南平顶山人,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 liumingyue@caas.cn

① 数据来源: 《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5.55亿亩 今年稳慎推进农村承包地二轮延包试点》, 网址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077961024703581&wfr=spider&for=pc>。

② 数据来源: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解读《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 网址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8415187564255292&wfr=spider&for=pc>。

承包权稳定性和经营权稳定性。其中,前者通过确权颁证划定权利边界,有助于农地投资<sup>[1]</sup>、劳动力非农转移<sup>[2]</sup>、耕地质量与生态保护<sup>[3]</sup>、农业生产效率提高<sup>[4]</sup>等;后者通过流转契约安排以强化产权增值,有益于转入地保护性投资<sup>[5]</sup>、流转地耕地质量提升<sup>[6]</sup>、转入户经营绩效改善<sup>[7]</sup>等。随着确权颁证深入实施,土地承包权稳定性得以有效维护,而农地经营权稳定性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已有研究主要从流转对象<sup>[8]</sup>、流转期限<sup>[9]</sup>、合同规范<sup>[10]</sup>、契约安全<sup>[11]</sup>、违约风险<sup>[12]</sup>、契约续约<sup>[13]</sup>等方面讨论农地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囊括契约履行风险与契约续约风险两类。具体而言:一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缔约关系约束、违约失信惩戒、政策措施干预等方面分析原始契约履行中经营权非稳定的缓解路径。①多数农地流转双方为亲朋邻里关系,强关系网络在降低信息搜寻、谈判签约和履约监督等成本的同时,也会通过群体监督、面子观念、非正式规范等机制约束流转双方遵守契约<sup>[14]</sup>。②农地流转契约已被纳入基层社会治理规则,信誉维护成为非正式规则运行的助推剂。如果流转双方违反契约,失信行为在关系群体中引起连锁反应,既增加其再次缔约的成本,也会产生市场交易受阻、社会融资困境等预期经营损失<sup>[15]</sup>。③政府通过缔约指导和备案监管等措施强化农地流转契约的规范性与执行度,在正式规则与社会规范双重约束下,农地契约履行中经营权稳定性得以逐渐恢复,有助于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农地租赁市场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现有文献鲜有从契约续约视角分析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农地流转续约本质上是契约双方基于契约履行所得与续约预期收益的农地处置决策。在当期流转期限内,转出户续约意愿越强以及续约期限越长,越有助于提高农地经营权稳定性以及转入地适度规模经营,引导或激励转入户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耕地质量保护、提高“跨期收益”技术采纳率<sup>[16,17]</sup>。如刘灵辉<sup>[13]</sup>认为家庭农场(转入户)受制于转出户的续约意愿,农地续约成为悬在家庭农场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为此,识别转出户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的关键驱动因素成为维持农地经营权稳定性、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

与当期转出农地不同,转出户续约通常取决于

农地流转获取的租金等直接收益和家庭劳动力重新配置产生的间接收益是否优于续约前的收入水平。已有研究证实了中国农地流转租金呈现上涨趋势,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农地租用价格从2014年的529元/亩上涨到2018年的864元/亩<sup>[18]</sup>。然而,农地流转租金收入仍远不能满足家庭消费增长与福利改善需求。尽管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非农就业“孰因孰果”的争论尚未明确<sup>[19]</sup>,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农地流转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通过本地或跨区非农就业获取的工资性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据国务院扶贫办数据统计,2019年超过70%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选择外出就业,工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比超过65%<sup>[20]</sup>。因此,提高非农就业稳定性,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创业,成为落实“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应有之义。

非农就业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关系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学术界关于“非农就业稳定性”并没有明确界定,而是通过“就业稳定性”予以表达并阐释其基本内涵。如谢勇<sup>[21]</sup>采用更换就业城市的频率、更换工作单位的频率、现职的就业持续时间、劳动合同签订等指标评价就业稳定性;袁方等<sup>[22]</sup>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在当前企业的工作年数、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定义就业稳定性;谢涵等<sup>[23]</sup>认为就业稳定性可以直观反映劳动力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以及稳定的就业状态。与此同时,新就业形态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带来严峻挑战。新就业形态是指新冠疫情、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叠加催生发展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工作模式与去雇主化、平台化的就业模式的组合业态<sup>[24,25]</sup>。网约车服务、外卖配送、快递服务和平台销售等职业呈现的新就业形态成为非农就业的重要渠道。具体而言:①疫情冲击成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的首要影响因素。白云丽等<sup>[26]</sup>研究发现,疫情暴发导致18%的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其非农就业岗位,非农就业时长缩短了5.7%,年工资收入减少了5.3%。②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议,比如田鸽等<sup>[27]</sup>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非农就业,但存在劳动力技能禀赋与数字经济技能偏向的异质性,进而影响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③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制约因素,这种情境

2023年4月

在新就业形态下尤为突出,进而导致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跨省农民工数量下降。

新就业形态下非农就业稳定性通过生计渠道选择与家庭收入波动影响农户行为决策。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农就业稳定性与农地流转因果关系讨论,认为非农就业稳定性减弱通过进城务工意愿降低<sup>[28]</sup>、就业技能门槛提高<sup>[29]</sup>、劳动力配置效率降低<sup>[30]</sup>、生计保障与家庭福利减弱<sup>[31]</sup>等路径阻碍农地或林地流转,而对新就业形态下非农就业稳定性如何影响农地流转续约的实证研究较少。从已有研究来看,非农就业稳定意味着非农就业时间的稳定,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稳定迁移,削弱转出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条件<sup>[32]</sup>;表征着非农收入的稳定,通过收入比较优势降低转出户对农业收入的原始依赖<sup>[33]</sup>,增强其续约意愿并延长续约期限;体现着生计风险缓释的稳定,通过提高非农就业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降低转出户生计风险感知<sup>[34]</sup>,进而激励其表达出明确的续约意愿和较长的续约期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基于陕西和甘肃2省516户农地转出户截面数据,采用IV-Heckman模型和中介效应法实证检验农村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续约的影响和传导机制。本文边际贡献在于:①从非农就业时间、非农收入占比、非农就业满意度3个层面刻画并测度非农就业稳定性,以弥补原有指标评价缺陷。②从续约意愿和愿意续约期限2个层面表征农地流转续约,并采用IV-Heckman模型对农地流转续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克服非农就业稳定性测量误差、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续约意愿产生的样本选择问题。③不仅分析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续约的直接影响,还采用中介效应法并从人口吸附效应、转出收益预期、生计风险感知3个层面探讨非农就业稳定性的传导机制,以期相关部门提高非农就业稳定性与推进农地流转续约提供决策参考。

##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从幸福观到效用论,再到“可行能力(Capability)”,福利经济学可通过微观个体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来评价总体福利<sup>[35]</sup>。土地和劳动力等可支配生产要素易获得仍然是提高个体行为能力与改善家庭福利的禀赋条件。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经

历了农地与劳动力从粘合到剥离的过程,驱动力则是两类生产要素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在就业渠道变动中寻求家庭福利最优。尽管已有研究证实,农业机械化发展导致农村劳动力剩余,家庭兼业化趋势明显,进而非农就业并不一定促进农地流转<sup>[36]</sup>。然而,在考虑非农就业稳定性指标后,非农就业与耕地务农之间的张力逐渐拉大,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带来的务农时间挤压、收入比较优势及替代农地保障会提高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愿意续约期限。具体而言:①非农就业稳定意味着重返务农的时间被挤压,抑制了农业生产最低劳动力投入需求。然而,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家庭男女劳动力角色分工,但是女性劳动力主要从事老幼照料,实际参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较低<sup>[37]</sup>。②非农就业稳定意味着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显著高于农地经营收益。非农就业稳定构成了小农有限理性的边界条件,提高转出户续约预期收益,诱导其持续从事非农就业或经营,最终增强其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并延长续约期限。③非农就业稳定意味着生计风险缓释,降低农地生计保障功能,减少转出户对农地心理依赖,促使其积极参与农地流转续约。可见,非农就业稳定能够诱导转出户表达续约意愿和愿意延长续约期限,并通过人口吸附效应、转出收益预期、生计风险感知3个方面机制发挥功效(图1)。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 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对转出户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具有吸附家庭剩余劳动力和非劳动力(老幼被照料群体)的作用。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兼业式(季节性非农就业)和钟摆式(常年非农就业)两种形态<sup>[38]</sup>。非农就业稳定通过增强非农就业时间的刚性需求可以促使农地转出户从兼业向钟摆就业状态转移,逐渐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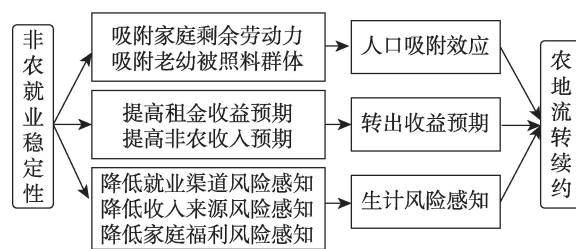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ure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离农业生产实践,从而改变“离乡不离土”的生计策略。②依据新迁移经济理论,家庭效用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是家庭成员迁移的决定因素<sup>[39]</sup>。随着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以女性劳动力和随迁子女进城为代表的家庭迁移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生力量。为此,家庭劳动力整体迁移改变了转出户兼业务农的弹性时间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条件,促使其在流转期限届满后愿意续约并延长续约期限。③农村养老负担已成为束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朱玲等<sup>[40]</sup>研究发现,当高龄父母需要长期照护时,年轻夫妇中的工资较低者通常留守家乡。然而,由于对医疗条件改善和子女团聚生活的追求,部分农村老年群体也跟随非农就业子女进城,代际迁移在农村社会悄然演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通过释放人口吸附效应影响农地流转续约。

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能够提高转出户对续约流转的租金收益和非农收入预期。基于主观期望理论,在信息不对称或不确定条件下,微观个体基于经验认知、信息获取、收益预期等形成主观判断,从而作出行为决策<sup>[41]</sup>。收益预期对于契约质量推进具有重要影响<sup>[42]</sup>。转出户流转续约通常是基于续约预期收益的直接行为决策,而续约预期收益则依赖于当期流转收益的理性判断。对于转出户而言,当期农地流转收益主要由租金收益和非农收入组成,具体而言:①非农就业稳定性越强,转出户违约风险越低,流转契约规范性和执行度越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效益越好。转入户经营绩效能够保证契约租金及时足额支付,进而促使转出户形成稳定的租金预期,最终愿意流转续约并延长续约期限。②非农就业稳定带来的非农收入提高能够淡化农地保障功能,强化农地财产属性,盘活农地产权增值,降低转出户对农地的生计依赖。③在非农就业产生收入比较优势时,转出户积极追求流转续约预期收益,倾向持续稳定地投入更多时间、资金和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 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通过提高转出收益预期影响农地流转续约。

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能够降低转出户就业渠道、收入来源和家庭福利等生计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个体基于禀赋约束和环境条件对风险概率作

出的主观判断。风险感知在风险决策中发挥着关键角色<sup>[43]</sup>。学术界关于风险感知及其角色功效的研究较为成熟,并依据风险损害类型划分为多项感知类型。农地资源充当着农村居民的生计保障和就业缓冲功能。对于农地转出户而言,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是生计风险感知作用的结果。“可持续生计”表征着转出户就业渠道多样化、收入来源稳定与家庭福利持续改善。①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能够缓解转出户对农业产业依赖,拓展家庭就业渠道和职业选择,降低农地对劳动力束缚,通过就业渠道多样化降低生计风险感知。②农业生产易遭受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冲击,具有典型脆弱性基本特征,这也成为转出户生计风险感知主要的驱动力。然而,非农就业稳定表征着稳定的家庭收入来源,通过降低农业生产和收入风险的冲击,增强非农收入的替代效应和比较优势,能够缓解转出户生计风险感知。③非农就业稳定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也会减弱转出户对农地的情感依赖,增强转出户家庭福利效应,诱导其愿意续约流转并延长续约期限。可见,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通过弱化转出户生计风险感知促使其愿意流转续约,从而保障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和转入地连片规模经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4: 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通过弱化生计风险感知影响农地流转续约。

### 3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2年1—2月课题组对陕西的渭南、延安、安康、宝鸡市和甘肃的庆阳、天水、武威、张掖市共8个地级市开展的“非农就业、地权稳定与乡村振兴”专题问卷调查。样本区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陕西和甘肃省是中国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数量庞大,以季节性流动和年度流动为主,非农就业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②样本区家庭耕地面积较小,以细碎化耕作为主,农地流转潜力较大,以关中平原和河西走廊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发展强劲。③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和网络零售商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样本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新生力量。结合样本区农业农村部门建议,课题组采用分

2023年4月

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8个样本市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体禀赋特征、家庭经营情况、非农就业信息、农地流转特征、集体经济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内容。具体抽样步骤为:在每个市随机抽取样本县(区)3~4个,每个县(区)随机抽取样本乡镇4~6个,每个乡镇随机抽取样本户8~12户。调研共发放问卷1750份,剔除数据缺失、明显存伪等样本51份,共获取有效问卷1649份。其中,陕西871份,占比52.82%;甘肃778份,占比47.18%。结合研究需要,本文提取样本中516户农地转出户数据用于实证研究,占调查样本总量的31.29%,其中陕西农地转出户276户,占比53.49%;甘肃转出户240户,占比46.51%。

根据表1中户主基本特征可得,转出户户主以男性为主,样本量占比为77.71%,女性在家庭经营决策中比重较低;户主以36~60岁中年为主,样本量占比为66.86%,劳动力年龄结构处在合理区间;户主受教育年限集中在7~9年,样本量占比为63.18%,以初中教育为主,受教育水平偏低。同时,转出户幼儿数量占比和老人数量占比集中在0.2~0.4区间,样本量占比分别为58.53%和52.32%,表明转出户家庭抚育和赡养负担较重;非农就业人数占比主要在0.3~0.6区间,样本量占比为72.87%,表明转出户非农就业趋势明显。此外,家庭耕地面积较小,户均小于0.2 hm<sup>2</sup>的样本量占比达54.65%,同时耕地块数大于4块的样本量占比达55.62%,耕地经营规模较小且细碎化严重。

## 3.2 变量选取

### 3.2.1 因变量

因变量为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已有文献关于农地流转续约的研究集中在续约意愿或倾向,且多采用类别变量指标予以表征<sup>[44]</sup>。农地流转续约直接关系到地权稳定性,续约期限在维持农地经营权稳定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此,本文从续约意愿和愿意续约期限2个层面刻画农地流转续约,前者属于二元离散变量,后者属于连续型变量。样本中愿意续约的转出户有303户、不愿意续约的转出户有213户,分别占样本量的58.72%和41.28%;平均续约期限为3.752年。

### 3.2.2 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非农就业稳定性。已有文献关于非农就业稳定性的测度多聚焦于外出务工职业类型的稳定性研究,囊括就业单位稳定性、就业地稳定性、务工时间稳定性等<sup>[38]</sup>。然而,从实地调研来看,转出户非农就业类型中以外出务工和个体经营为主,囊括长期合同用工、平台服务用工和网络销售用工等多种职业类型,仅从就业单位、就业地和就业时间层面表征非农就业稳定性难以匹配多样职业类型。非农就业稳定性是非农就业时间、非农就业收入和非农就业心理稳定的综合反映。为此,本文从非农就业时间稳定性、非农收入稳定性和非农就业心理稳定性3个层面表征非农就业稳定性。同时,借鉴黄晓慧等<sup>[45]</sup>的相关研究,对各项表征指标取均值以测度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表2中变量描

表1 样本转出户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armland transfer-out households

变量	分类	比例/%	变量	分类	比例/%
户主性别	男	77.71	幼儿数量占比	<0.2	24.22
	女	22.29		[0.2, 0.4]	58.53
户主年龄/岁	<36	27.52		>0.4	17.25
	[36, 60]	66.86	老人数量占比	<0.2	39.54
	>60	5.62		[0.2, 0.4]	52.32
户主受教育年限	<6	12.60		>0.4	8.14
	[7, 9]	63.18	非农就业人数占比	<0.3	16.47
	[10, 12]	16.47		[0.3, 0.6]	72.87
	>12	7.75		>0.6	10.66
耕地面积/hm <sup>2</sup>	<0.2	54.65	耕地块数	<2	4.65
	[0.2, 0.4]	35.85		[2, 4]	39.73
	>0.4	9.50		>4	55.6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续约意愿	农地流转续约意愿(愿意=1;不愿意=0)	0	1	0.587	0.304
续约期限	愿意续约期限/年	1	10	3.752	0.721
自变量					
非农就业稳定性	取3项表征指标的均值	1	5	3.016	0.879
就业时间稳定性	家庭非农就业人员平均就业时间/月([1, 2]=1;[3, 4]=2;[5, 6]=3;[7, 8]=4;[9, 10]=5)	1	5	3.114	0.621
非农收入稳定性	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0, 20]=1;[20, 40]=2;[40, 60]=3;[60, 80]=4;[80, 100]=5)	1	5	3.309	0.823
就业心理稳定性	非农就业满意度评价(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5)	1	5	2.625	0.604
控制变量					
性别	户主性别(男=1;女=0)	0	1	0.777	0.201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24	68	47.295	3.104
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程度(<6=1;[7, 9]=2;[10, 12]=3;>12=4)	1	4	2.475	0.621
幼儿数量占比	6岁以下幼儿与家庭人口之比	0.000	0.600	0.262	0.065
老人数量占比	60岁以上老人与家庭人口之比	0.000	0.667	0.272	0.041
非农就业人数占比	非农就业人数与家庭人口之比	0.200	1.000	0.482	0.091
耕地面积	转出前耕地面积/hm <sup>2</sup>	0.117	0.834	0.245	0.057
耕地块数	转出前耕地块数	1	7	3.905	0.785
耕地类型	崎岖程度(平原=1;丘陵=2;山地=3)	1	3	1.725	0.426
租金支付满意度	转出户对租金支付额度和时间的满意度(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5)	1	5	3.895	1.042
流转合同备案	农地流转合同是否备案(备案=1;未备案=0)	0	1	0.630	0.095
流转对象	农地流转对象(亲朋好友=1;陌生人=0)	0	1	0.746	0.082
合作社参与	是否参与合作社(参与=1;未参与=0)	0	1	0.397	0.055
地区虚拟变量					
是否位于陕西	以甘肃为对照组(是=1;否=0)	0	1	0.535	0.071

述性统计分析发现, 非农就业稳定性均值仅为3.016, 新就业形态下样本区转出户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较低。

3.2.3 控制变量

借鉴兰勇等<sup>[7]</sup>和苏岚岚等<sup>[46]</sup>的相关研究, 本文选取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幼儿数量占比、老人数量占比、非农就业人数占比、耕地面积、耕地块数、耕地类型、租金支付满意度、流转合同备案、流转对象、合作社参与等13项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同时, 以甘肃为对照组, 设置地区虚拟变量“是否位于陕西”。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3.3 模型设定

3.3.1 IV-Heckman 模型

在分析农村非农就业稳定性影响农地流转续约时, 要处理好续约意愿产生的样本选择问题以及

非农就业稳定性测量误差和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①受限于从业技能门槛、劳动力市场政策变动、家庭抚育负担等因素, 部分转出户表达不愿意续约, 进而无法观测到其愿意续约期限, 故存在样本选择问题。②实地调查中转出户可能基于猜测给出非农就业稳定性测度的答案, 进而导致测量误差问题。③随着转出户续约意愿增强, 非农就业愿望更为强烈, 非农就业选择和稳定性程度越高, 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 借鉴温兴祥等<sup>[47]</sup>的相关研究, 拟采用工具变量 Heckman 模型(IV-Heckman)克服非农就业稳定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续约意愿产生的样本选择问题。其中, 本文选择“非农就业地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非常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非常满意=5)”作为工具变量, 主要是因为: ①公共文化服务处于公共服务体



2023年4月

系的金字塔顶端位置,属于非刚需服务范畴,能够对个体社会融入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②非农就业地的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利用和知识讲座等公共文化活动参与,能够显著提高非农就业地对转出户生计选择的粘合力,提高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③与子女入学和健康就医等刚需公共服务相比,非农就业地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过程是缓慢渐变的,并不会对转出户续约意愿和愿意续约期限有直接影响。因此,非农就业地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对于农地流转续约是严格外生的。

IV-Heckman模型可分为两个阶段构建:第一阶段,将内生解释变量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工具变量和所有外生解释变量作线性回归,得到非农就业稳定性潜变量拟合值;第二阶段,采用Heckman两步法对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进行估计,具体可分解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建立方程分析续约意愿(选择方程),即将转出户续约意愿对非农就业稳定性潜变量拟合值、残差、外生解释变量作Probit回归,方程式表达如下:

$$\text{Probit}(\text{willingness}_i) = \alpha_1 + \beta_1 \text{stability}_i^* + \gamma_1 \mathbf{X}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中:  $\text{stability}_i^*$  为非农就业稳定性潜变量;  $\text{willingness}_i$  为转出户续约意愿,如果转出户  $i$  愿意续约,  $\text{willingness}_i$  值为1;反之取值为0;  $\mathbf{X}$  为控制变量向量;  $\varepsilon_i$  表示随机误差项;  $\alpha_1$ 、 $\beta_1$ 、 $\gamma_1$  为待估参数。

为有效识别方程,在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影响因素  $\mathbf{X}$  中,必须包含一个只影响续约意愿而不影响续约期限的变量。因此,本文选择“农地流转氛围”作为识别变量,通过“当地社会对农地转出的赞赏或支持程度(非常不赞赏或支持=1,不赞赏或支持=2,一般=3,赞赏或支持=4,非常赞赏或支持=5)”来表征。农地流转氛围越好,转出户续约意愿越强烈,但其与续约期限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同时,为了修正续约意愿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还需要估算转出户样本的逆米尔斯比(Inverse Mills Ratio, IMR)。

第二步,构建方程分析续约期限(结果方程),即将转出户愿意续约期限对非农就业稳定性潜变量的拟合值、残差、外生解释变量作OLS回归,方程式表达如下:

$$\text{Term}_i = \alpha_2 + \beta_2 \text{stability}_i^* + \gamma_2 \mathbf{Z} + \varepsilon_i \quad (2)$$

式中:  $\text{Term}_i$  为第  $i$  个转出户愿意续约的期限;  $\mathbf{Z}$  为影响续约期限的控制变量向量;  $\alpha_2$ 、 $\beta_2$ 、 $\gamma_2$  为待估

计参数,其中  $\beta_2$  为克服非农就业稳定性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后的估计量。同时,估计中可根据IMR值显著性判断模型中是否存在样本选择问题。此外,考虑到选取的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控制变量选取中,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对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的最大值为2.05,小于临界值10,故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 3.3.2 中介效应模型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人口吸附效应、转出收益预期、生计风险感知在非农就业稳定性影响农地流转续约中的影响机制,具体检验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检验非农就业稳定性对中介变量的影响,需要克服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构建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模型估计,方程式表达如下:

$$\text{Media}_i = \alpha_3 + \beta_3 \text{stability}_i^* + \gamma_3 \mathbf{X} + \varepsilon_i \quad (3)$$

式中:  $\text{Media}_i$  为中介变量,即人口吸附效应,用“非农就业地居住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0%, 20%]=1, (20%, 40%]=2, (40%, 60%]=3, (60%, 80%]=4, (80%, 100%]=5)”来表征;转出收益预期,用“转出户对流转续约的收益期望(非常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非常高=5)”来表征;生计风险感知,用“转出户对家庭生计风险感知程度(非常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非常高=5)”来表征;  $\alpha_3$ 、 $\beta_3$  和  $\gamma_3$  为待估参数。

第二阶段,需要克服非农就业稳定性测量误差及其与农地流转续约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续约意愿产生的样本选择问题,继续采用IV-Heckman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text{Probit}(\text{willingness} = 1) = \alpha_4 + \beta_4 \text{stability}_i^* + \beta_5 \text{media}_i + \gamma_4 \mathbf{X} + \varepsilon_i \quad (4)$$

$$\text{Term}_i = \alpha_5 + \beta_6 \text{stability}_i^* + \beta_7 \text{media}_i + \gamma_5 \mathbf{Z} + \varepsilon_i \quad (5)$$

式中:  $\text{Probit}(\text{willingness} = 1)$  为转出户愿意续约的概率;  $\text{Term}_i$  为第  $i$  个转出户愿意续约的期限;  $\alpha_4$ 、 $\alpha_5$ 、 $\beta_4$ 、 $\beta_7$ 、 $\gamma_4$ 、 $\gamma_5$  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

最后,根据公式(1)–(5)估计结果,并借鉴温忠麟等<sup>[48]</sup>层次回归法检验各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IV-

Heckman模型的层次回归检验流程同孙光林等<sup>[49]</sup>的相关研究。

## 4 结果与分析

### 4.1 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影响的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仅考虑非农就业稳定性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转出户续约愿意产生的样本选择问题,同时考虑上述2个问题模型估计结果的差异,本文作了以下估计(表3):①分别单独使用IV-Probit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转出户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进行估计,仅克服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内生性问题,得到回归1和2。②使用普通Heckman模

表3 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影响的估计结果

Table 3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on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tension of transfer-out households

变量	IV-Probit	2SLS	Heckman		IV-Heckman	
	回归1 续约意愿	回归2 续约期限	回归3 续约意愿	回归4 续约期限	回归5 续约意愿	回归6 续约期限
非农就业稳定性	0.3026** (0.1421)	0.2626* (0.1500)	0.4127** (0.1842)	0.3014* (0.1713)	0.4408*** (0.1585)	0.3724** (0.1691)
性别	0.1045 (0.0720)	0.2124 (0.1454)	0.0738 (0.0502)	0.2514 (0.1676)	0.1201 (0.0828)	0.2605 (0.1725)
年龄	-0.3035* (0.1705)	-0.2712* (0.1523)	-0.3426* (0.1903)	-0.2901* (0.1593)	-0.3609** (0.1625)	-0.3007** (0.1285)
受教育年限	0.1025* (0.0557)	0.0621 (0.0492)	0.1104* (0.0596)	0.0616 (0.0462)	0.1002* (0.00551)	0.0605 (0.0451)
幼儿数量占比	-0.0724* (0.0338)	-0.0625** (0.0265)	-0.0812* (0.0369)	-0.0601** (0.0271)	-0.0723** (0.0337)	-0.0791** (0.0340)
老人数量占比	-0.0427** (0.0197)	-0.0301** (0.0137)	-0.0525** (0.0233)	-0.0305** (0.0132)	-0.0491** (0.0228)	-0.0380** (0.0163)
非农就业人数占比	0.1915*** (0.0613)	0.2630*** (0.0910)	0.1901*** (0.0590)	0.2524*** (0.0901)	0.2015*** (0.0669)	0.2609*** (0.0938)
耕地面积	0.3511 (0.2239)	0.1415 (0.0901)	0.3416 (0.2228)	0.1238 (0.0840)	0.3425 (0.2251)	0.1369 (0.0902)
耕地块数	0.0025* (0.0013)	0.0016 (0.0012)	0.0030* (0.0016)	0.0019 (0.0014)	0.0039* (0.0021)	0.0028 (0.0020)
耕地类型	0.0625 (0.0484)	0.0212 (0.0163)	0.0671 (0.0524)	0.0208 (0.0157)	0.0726 (0.0571)	0.0281 (0.0208)
租金支付满意度	0.4018** (0.1801)	0.1521 (0.1014)	0.4065** (0.1873)	0.1537 (0.1045)	0.4109** (0.1826)	0.1602 (0.1053)
流转合同备案	0.3012 (0.1981)	0.1074 (0.0692)	0.3031 (0.2047)	0.1162 (0.0779)	0.3054 (0.2036)	0.1178 (0.0780)
流转对象	0.0621*** (0.0206)	0.0205*** (0.0067)	0.0632*** (0.0215)	0.0216*** (0.0072)	0.0695*** (0.0239)	0.0207*** (0.0071)
合作社参与	0.0000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1)
是否位于陕西	0.0035 (0.0023)	0.0012 (0.0008)	0.0040 (0.0027)	0.0010 (0.0006)	0.0046 (0.0033)	0.0018 (0.0011)
农地流转氛围	—	—	0.1205*** (0.0439)	—	0.1218*** (0.0435)	—
观测值	516	303	516	303	516	303
IMR值	—	—	8.25***	—	8.12***	—
DWH检验值	23.14**	20.69**	—	—	18.25**	—
工具变量T值	6.15***	5.29***	—	—	5.25***	—
一阶段F值	121.56	106.35	—	—	115.28	—

注:\*, \*\*, \*\*\*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2023年4月

型对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进行联立估计,仅克服续约意愿产生的样本选择问题,得到回归3和4。③使用IV-Heckman模型进行联立估计,同时克服上述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得到回归5和6。

从表3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①根据回归1和2,DWH(Durbin-Wu-Hausman)检验值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非农就业稳定性是内生解释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的 $F$ 值分别为121.56和106.35(大于临界值10)、工具变量 $T$ 值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估计结果是有效的。②根据回归3和4,样本选择偏差检验 $IMR$ 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续约意愿方程存在样本选择偏差。③根据回归5和6,工具变量 $T$ 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样本选择偏差检验 $IMR$ 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识别变量“农地流转氛围”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IV-Heckman模型的估计结果有效。

与回归1和3相比,回归5中非农就业稳定性的系数值增大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同时考虑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后,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意愿的影响更为可靠。同时,与回归2和4相比,回归6中非农就业稳定性的系数值增大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克服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后,非农就业稳定对转出户流转续约期限影响的估计结果也更为可信,H1得到证实。可能的解释为:①除大宗粮食主产区外,中国其他地区农业产业仍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外出务工和个体经商等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转出户重新或兼业务农的时间会被大幅挤压,其续约意愿更为强烈,也更愿意延长转出期限。②以小规模经营、碎片化耕作、抗风险能力弱为特征的小农经营收益已经难以满足家庭消费支出与福利改善需求。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强会显著提高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改变转出户摇摆兼业的生计策略,促使其全身心从事非农产业,从而表达出清晰的续约意愿。③农地资源是传统农户生计维护与收入来源的可靠保障,非农就业稳定性强调生计策略替代的稳定性与家庭收入来源的稳定性,能显著降低转出户家庭生计风险,并成为农地流转续约的持久动力。

部分控制变量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也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①户主年

龄、幼儿数量占比、老人数量占比对转出户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能的解释为:一方面,户主年龄越大,劳动力非农转移受阻,劳动力配置效率越低,就业稳定性越差,更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故流转续约意愿较弱。另一方面,幼儿和老人占比越高,家庭抚养和赡养负担越重,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员、就业时间、资本投入均会减少,故部分转出户并不愿意续约并从事农业兼业经营。②户主受教育年限、耕地块数和租金支付满意度对转出户续约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续约期限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为: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技术知识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越强,非农就业的适应性和稳定性程度越高,从而表达出越强的续约意愿。同时,耕地块数越多,农地细碎化特征越明显,农业经营效益就越低,非农收入的替代效应越强,转出户续约意愿越强烈。此外,如果转出户对本轮流转租金支付时效和金额的满意度越高,其越倾向于通过续约租金替代直接农业参与,积极参与农地流转续约。然而,转出户愿意续约期限的不确定性通常是其对家庭农生计风险评估的结果,在疫情冲击和新就业形态叠加影响下,这种不确定性尤为明显。③非农就业人数占比和流转对象对转出户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为:非农就业人数占比越高,表明家庭劳动力转移越充分,获取非农收入的机会和规模均越大,非农就业对转出户的吸附力越强,转出户重新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越低,故更愿意继续缔约。同时,土地流转对象“人格化”“情感化”倾向比较强烈,能够缓释转出户对于农地经营权“流失”风险的感知,诱导其专注从事非农产业,并提高非农收入比较优势,促进农地流转续约市场蓬勃发展。

## 4.2 影响机制分析

### 4.2.1 人口吸附效应的中介效应分析

人口吸附效应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中回归7-9。从回归7估计结果可得,非农就业稳定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非农就业稳定性提高有助于增强就业地对家庭人口的吸附效应。回归8和9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稳定性和人口吸附效应对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非农就业稳定性和人口

表4 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

Table 4 Impact mechanism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on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tension of transfer-out households

变量	2SLS	IV-Heckman		2SLS	IV-Heckman		2SLS	IV-Heckman	
	回归7 人口吸附效应	回归8 续约意愿	回归9 续约期限	回归10 转出收益预期	回归11 续约意愿	回归12 续约期限	回归13 生计风险感知	回归14 续约意愿	回归15 续约期限
非农就业稳定性	0.2801*** (0.0933)	0.4001*** (0.1482)	0.3526** (0.1491)	0.0926*** (0.0301)	0.4205*** (0.1405)	0.3672** (0.1479)	-0.1925*** (0.0582)	0.4141*** (0.1352)	0.3539** (0.1485)
人口吸附效应		0.1406** (0.0639)	0.0925** (0.0441)						
转出收益预期					0.1905** (0.0609)	0.0724 (0.0452)			
生计风险感知								-0.1026** (0.0438)	-0.0627** (0.030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516	516	303	516	516	303	516	516	303
IMR值	—	8.05***	—	—	8.16***	—	—	8.09***	—
DWH检验值	14.04***	17.26**	—	14.09***	17.95**	—	14.88***	17.68**	—
工具变量T值	3.15***	4.75***	—	3.90***	4.82***	—	3.65***	4.41***	—
一阶段F值	98.23	104.28	—	91.09	105.40	—	96.65	104.91	—

吸附效应增强能够提高转出户续约意愿并延长续约期限,人口吸附效应在非农就业稳定性影响农地流转续约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可能的解释为:一方面,以兼顾子女入学和赡养老人为特征的城乡“摇摆”人口流动成为转出户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人口吸附效应主要通过剩余劳动力吸附、非劳动力成员吸附以及团聚生活感追求能够有效替代转出户务农或兼业生计策略,激励转出户积极参与续约缔约,故H2得到证实。

#### 4.2.2 转出收益预期的中介效应分析

转出收益预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回归10-12。从回归10和11估计结果可得,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收益预期和流转续约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转出收益预期在非农就业稳定性影响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然而,根据回归12可得,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续约期限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为了验证转出收益预期对流转续约期限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有必要进行Sobel检验。检验结果表明,Sobel检验值为0.38(低于临界值0.97),表明转出收益预期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为:新就业形态直接对转出户非农就业稳定性造成负面冲击,疫情管控政策约束、就业市场供需变动、就业技能偏好选择导致非农劳动力就业市场的风险增加。为此,尽管转

出户表达愿意续约,但是在就业不确定情境下无法对续约期限作出合理预测,故H3得到部分证实。

#### 4.2.3 生计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生计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回归13-15。从回归13估计结果可得,非农就业稳定性对生计风险感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提高非农就业稳定性能够降低转出户生计风险感知水平。回归14和15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计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生计风险感知在非农就业稳定性影响农地流转续约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可能的解释为:一方面,生计风险感知是转出户家庭经营决策最主要的内在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提高直接缓解转出户生计压力,同时也会减轻其对农地资源依赖度,有效降低其生计风险感知,从而增强转出户农地流转意愿并延长流转期限。另一方面,收入渠道多样化能够有效缓解家庭生计风险。为此,生计风险感知越低,转出户全职或兼业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概率越低,进而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意愿被激发,续约期限表达也越为明确,故H4得到证实。

#### 4.3 稳健性检验

如表5所示,为了验证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回归5和6)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以下3种方法进

2023年4月

表5 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influencing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tension of transfer-out households

变量	检验1		检验2		检验3	
	回归16 续约意愿	回归17 续约期限	回归18 续约意愿	回归19 续约期限	回归20 续约意愿	回归21 续约期限
非农就业稳定性	0.4123*** (0.1403)	0.3402** (0.1642)	0.4204*** (0.1425)	0.3429** (0.1630)	0.4315*** (0.1415)	0.3481** (0.160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516	303	486	273	516	303

行稳健性检验。

#### 4.3.1 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

非农就业稳定性由非农就业时间、非农收入占比、非农就业满意度3项指标组成。本文重新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实现各项指标降维并测度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根据检验1中回归16和17可得,与基准回归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没有明显差异,表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 4.3.2 去除被解释变量极端值

对被解释变量中续约期限统计分析发现,303份续约期限样本变量呈现右偏分布,故按照10%的比例删除续约期限极大值样本30份,剩有总样本486份,其中愿意续约和有续约期限样本273份。根据检验2中回归18和19可得,与基准回归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的影响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没有显著变化,表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 4.3.3 删除部分控制变量

尽管控制变量多重共线性已被排除,但是年龄、耕地面积、耕地块数与其他控制变量的量纲差异较大,故将这3个控制变量删除并重新回归。根据检验3中回归20和21可得,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的影响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仍然没有显著变化,再次证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 5.1 结论

新就业形态下提高非农就业稳定性与促进农地流转续约对于维持农地地权稳定、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和加强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陕西和甘肃2省516户农地转出户

截面调查数据,采用IV-Heckman模型和中介效应法,实证检验农村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新就业形态下样本区转出户非农就业稳定性较低,均值仅为3.016。58.72%的转出户愿意流转续约,续约意愿有待增强。同时,农地流转续约期限为3.752年,愿意流转续约的期限较短。

(2)在克服非农就业稳定性测量误差及其与农地流转续约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问题、农地流转续约意愿产生的样本选择问题后,农村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非农就业人数占比和与流转对象对转出户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耕地块数和租金支付满意度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续约期限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户主年龄、幼儿数量占比、老人数量占比对转出户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些结果在改变非农就业稳定性的测度方法、去除续约期限的极端值、删除量纲差异较大的部分控制变量后仍然显著。

(3)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人口吸附效应和生计风险感知在非农就业稳定性影响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意愿和续约期限中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转出收益预期仅在非农就业稳定性影响农地流转续约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 5.2 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得到如下4点政策启示:

(1)增强企业非农就业吸纳能力。政府应通过税费减免、补贴补助、信贷支持等多渠道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推进其融入“双循环”产业链,提高其对非农就业人员吸纳



能力。

(2)提高转入户非农就业技能。适应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趋势,对非农就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跟踪培训,畅通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成长渠道,通过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满足非农就业人员多元化学习需求。同时,鼓励企业帮助非农就业人员完成人力资源适应转型,跨过数字时代技能门槛,缓解岗位需求错配。

(3)加强非农就业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拓展非农就业家庭在子女入学、就医看病、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消除非农就业地公共服务排斥并降低转入户服务获取门槛,着力解决新就业群体公平择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现实问题,提高其社会融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加强农地流转续约全链条管理。通过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建设、流转合同备案制度、续约流转宣传引导等路径加强农地流转续约全链条管理,稳定形成具有市场激励机制的流转价格和期限,不断提高转入户流转续约意愿并延长续约期限。同时,支持转入户提高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效益,增强农地流转双方缔约续约的内生动力。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杨宗耀, 纪月清. 地权稳定性与农户土地投资: 基于确权政策预期与落地影响差异的讨论[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6): 66-75. [Yang Z Y, Ji Y Q. Tenure security and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Different impacts of land titling policy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J].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6): 66-75.]
- [2] 洪伟杰, 胡新艳. 地权稳定性与劳动力非农转移[J]. 经济评论, 2019, (2): 34-47. [Hong W J, Hu X Y. Farmland rights stability and labor non-agriculture migration[J]. Economic Review, 2019, (2): 34-47.]
- [3] 钱龙, 冯永辉, 卢华. 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基于新一轮确权颁证调节效应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2): 104-115. [Qian L, Feng Y H, Lu H. Impact of land tenure stability on farmer's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 Analysis based on adjustment effect of the new round land certification[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1(2): 104-115.]
- [4] 耿鹏鹏. “规模实现”抑或“技术耗散”: 地权稳定如何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效率?[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1): 108-120. [Geng P P. “Achievement of scale” or “dissipation of technology”: How does stability of land rights affec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farmers?[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 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1(1): 108-120.]
- [5] 邹伟, 崔益邻, 周佳宁. 农地流转的化肥减量效应: 基于地权流动性与稳定性的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34(9): 48-57. [Zou W, Cui Y L, Zhou J N.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fertilizer reduction: An analysis of transferability and security of land rights[J]. China Land Science, 2020, 34(9): 48-57.]
- [6] 李成龙, 周宏. 农户会关心租来的土地吗? 农地流转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J]. 农村经济, 2020, (6): 33-39. [Li C L, Zhou H. Do farmers care about rented land? Research on farmland transfer and farmland protection behavior[J]. Rural Economy, 2020, (6): 33-39.]
- [7] 兰勇, 蒋崑, 杜志雄. 农户向家庭农场流转土地的续约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1): 65-85. [Lan Y, Jiang M, Du Z X. A study on contract extension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 transfer from farmers to family farm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1): 65-85.]
- [8] 胡杰, 罗剑朝. 金融排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2, 44(11): 2178-2192. [Hu J, Luo J C.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exclusion on farming households' farmland transfer behavior[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11): 2178-2192.]
- [9] Paltasingh K R. Land tenure security and adoption of modern rice technology in Odisha, Eastern India: Revisiting Besley's hypothesis[J]. Land Use Policy, 2018, DOI: 10.1016/j.landusepol.2018.06.031.
- [10] Zhou Y P, Shi X P, Heerink N, et al. The effect of land tenure governance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ree provinces in Eastern China[J]. Applied Economics, 2019, 51(34): 1-18
- [11] 阿布都热合曼·阿布迪克然木, 石晓平, 饶芳萍, 等. “三权分置”视域下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户产权认知视角[J]. 资源科学, 2020, 42(9): 1643-1656. [Abudurehman A, Shi X P, Rao F P, et al. Tenure integrity, security, and farmland transf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Based on farmers' perception of land tenure[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9): 1643-1656.]
- [12] 王新刚, 司伟, 赵启然. 土地经营权稳定性对农户过量施肥的影响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地块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8): 162-168. [Wang X G, Si W, Zhao Q R.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stability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 on farmers' excessive fertiliz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ata of plot level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0, 41(8): 162-168.]
- [13] 刘灵辉.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合同期满续约过程中的利益博弈[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2): 79-87. [Liu L H. Benefit game between family farms and other farms when the 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pires and the contract needs to be renewed[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20(2): 79-87.]
- [14] 仇童伟, 罗必良. 流转“差序格局”撕裂与农地“非粮化”: 基于中

2023年4月

- 国29省调查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22, 38(9): 96–113. [Qiu T W, Luo B L. The laceration of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land transfers and non–grain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29 provinces in Chi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9): 96–113.]
- [15] Fei R L, Lin, Z Y, Chunga, J. How land transfer affects agricultural land use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s agricultural sector [J]. Land Use Policy, 2021,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1.105300.
- [16] 徐志刚, 张骏逸, 吕开宇. 经营规模、地权期限与跨期农业技术采用: 以秸秆直接还田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3): 61–74. [Xu Z G, Zhang J Y, Lv K Y. The scale of operation, term of land ownership and the adoption of inter–tempor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 example of straw return to soil directly[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 (3): 61–74.]
- [17] 张建, 诸培新, 南光耀. 不同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影响研究: 以江苏省四县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3): 96–104. [Zhang J, Zhu P X, Nan G Y. Farmland transfer patterns and household long–term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behavior: Based on surveys of four counties in Jiangsu Province[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19(3): 96–104.]
- [18] 邵亮亮. 中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土地形成及使用特征: 基于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4–2018年监测数据[J]. 管理世界, 2020, 36(4): 181–195. [Gao L 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composition and usage of the crop family farms: Based on a unique 5–year consecutive family farm monitoring dataset (2014–2018)[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4): 181–195.]
- [19] 周文, 赵方, 杨飞, 等. 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 理论与模拟[J]. 经济研究, 2017, 52(6): 183–197. [Zhou W, Zhao F, Yang F, et al. Land transfer,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oretical and simulation test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7, 52(6): 183–197.]
- [20] 程国强, 朱满德. 2020年农民增收: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与应对建议[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4): 4–12. [Cheng G Q, Zhu M 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n 2020: Impacts of and recommendations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0, (4): 4–12.]
- [21] 谢勇. 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9): 54–62. [Xie Y. Job stability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xample of case in Jiangsu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5, 36(9): 54–62.]
- [22] 袁方, 安凡所. 就业稳定性、市民化意愿与农民工消费[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9, 33(3): 96–111. [Yuan F, An F S. A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citizenship will and consumption of migrant workers[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2019, 33(3): 96–111.]
- [23] 谢涵, 林光华, 方萍萍. 家庭负担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基于CFPS 2014–2016的分析[J]. 江苏农业科学, 2020, 48(11): 42–46. [Xie H, Lin G H, Fang P P. Impact of family burden on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Based on analysis of CFPS from 2014 to 2016[J]. Jiangsu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20, 48(11): 42–46.]
- [24] 彭伟华, 侯仁勇. 新就业形态下网络平台就业协同治理研究[J]. 理论学刊, 2022, (5): 145–153. [Peng W H, Hou R Y.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employment governance of network platform under new employment pattern[J]. Theory Journal, 2022, (5): 145–153.]
- [25] 马晔风, 蔡跃洲. 数字经济新就业形态的规模估算与疫情影响研究[J]. 劳动经济研究, 2021, 9(6): 121–141. [Ma Y F, Cai Y Z. Estimating the scale of new employ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J]. Studies in Labor Economics, 2021, 9(6): 121–141.]
- [26] 白云丽, 曹月明, 刘承芳, 等. 农业部门就业缓冲作用的再认识: 来自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6): 65–87. [Bai Y L, Cao Y M, Liu C F, et al. A recognition on the buffer rol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Evidence from off–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 (6): 65–87.]
- [27] 田鸽, 张勋. 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J]. 管理世界, 2022, 38(5): 72–84. [Tian G, Zhang X. Digital economy,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division of labor[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5): 72–84.]
- [28] Su B Z, Li Y H, Li L Q, et al. How does nonfarm employment stability influence farmers’ farmland transfer decision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land use policy[J]. Land Use Policy, 2018, DOI: 10.1016/j.landusepol.2017.09.053.
- [29] Li F, Feng S Y, Lu H L, et al. How do non–farm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mpact on large–scale farming? A spatial panel data analysis from Jiangsu Province,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21,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1.105517.
- [30] 孙德超, 周媛媛.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面临的现实困境、政策供给体系及其保障措施[J]. 经济问题, 2020, (1): 79–86. [Sun D C, Zhou Y Y. The facing practical dilemmas, policy supply system and guarantee measures of the three rights division of rural land [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20, (1): 79–86.]
- [31] 徐秀英, 石道金, 朱臻, 等. 农户非农就业对林地转出决策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浙江山区369户农户的调研[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0, 19(3): 342–351. [Xu X Y, Shi D J, Zhu Z, et al. Impact of off–farming employment on farmers’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forestland transfer out: A survey of 369 farmer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Zhejiang[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0, 19(3): 342–351.]
- [32] Si R S, Lu Q, Aziz N. Does the stability of farmland rental contract & conservation tillage adoption improve family welfare? Empirical insights from Zhangye,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21,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1.105486.
- [33] Sen B, Dorosh P, Ahmed M. Moving out of agriculture in Bangla-

- desh: The role of farm, non-farm, and mixed households[J]. World Development, 2021, DOI: 10.1016/j.worlddev.2021.105479.
- [34] Harkness C, Areal F J, Semenov M A, et al. Stability of farm income: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diversity and agri-environment scheme payments[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21, DOI: 10.1016/j.agsy.2020.103009.
- [35] Amartya S. Inequality Reexamine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6] 杨宇, 李容. 劳动力转移、要素替代及其约束条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 44-50. [Yang Y, Li R. Labor transfer, factor substitution and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2): 44-50.]
- [37] 贾蕊, 陆迁. 外出务工、女性决策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的影响: 以陕西、甘肃、宁夏3个省份农户调研数据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 (2): 122-134. [Jia R, Lu Q. The influence of working outside, female decision-making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in collective action: A case study of farmers' data from Shanxi, Gansu and Ningxia[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9, (2): 122-134.]
- [38] 栾江, 马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性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迁移异质性视角[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2): 203-216. [Luan J, Ma R.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tability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employment on 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igration heterogeneity[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1, 42(12): 203-216.]
- [39] 吕沛璐, 冯淑怡, 王博, 等. 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及其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 2022, 44(8): 1577-1588. [Lv P L, Feng S Y, Wang B, et al. Farming households' decision of farmland and rural labor alloc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8): 1577-1588.]
- [40] 朱玲, 何伟, 金成武.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养老照护变迁[J]. 经济学动态, 2020, (8): 3-19. [Zhu L, He W, Jin C W.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and changes in elderly care[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0, (8): 3-19.]
- [41] Shalini T, Puneet K, Sushant K, et al. What determine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natural food products? An expectancy theory approach[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DOI: 10.1016/j.jclepro.2021.129204.
- [42] 李立朋, 丁秀玲, 李桦. 资源支持视角下关系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 以黄河流域为例[J]. 资源科学, 2022, 44 (3): 450-463. [Li L P, Ding X L, Li H. Infl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n the land transfer of farming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support: An example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3): 450-463.]
- [43] 刘丽, 褚力其, 姜志德. 技术认知、风险感知对黄土高原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及代际差异[J]. 资源科学, 2020, 42(4): 763-775. [Liu L, Chu L Q, Jiang Z D.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cognition and risk perception on the willingness to adop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ies and it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4): 763-775.]
- [44] 兰勇, 蒋崑.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双方续约意愿研究: 基于湖南107家家庭农场和495名转出户的调研[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3(3): 58-64. [Lan Y, Jiang M. Study on the willingness of both sides of family farm 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107 family farms and 495 transferred farmers in Hu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019, 13(3): 58-64.]
- [45] 黄晓慧, 陆迁, 王礼力. 资本禀赋、生态认知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基于生态补偿政策的调节效应[J]. 农业技术经济, 2020, (1): 33-44. [Huang X H, Lu Q, Wang L L. Capital endowment,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0, (1): 33-44.]
- [46] 苏岚岚, 何学松, 孔荣. 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基于农地确权颁证调节效应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8): 17-31. [Su L L, He X S, Kong R.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farmers' behavior of farmland transfer: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gulatory role of farmland certificatio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 (8): 17-31.]
- [47] 温兴祥, 程超. 教育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创业收益吗? 基于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三阶段估计[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 (9): 80-96. [Wen X X, Cheng C. Can education help improve Chinese rural self-employers' revenue? A three-stage estimation based on evidence from CHIP rural household survey[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7, (9): 80-96.]
- [48]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 (5): 614-620. [Wen Z L, Zhang L, Hou J T, et al. Test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4, (5): 614-620.]
- [49] 孙光林, 李庆海, 杨玉梅. 金融知识对被动失地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 基于IV-Heckman模型的实证[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 (3): 124-144. [Sun G L, Li Q H, Yang Y M.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landless rural household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IV-Heckman model[J]. China Rural Survey, 2019, (3): 124-144.]



#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rur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on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tension of transfer-out households

SI Ruishi<sup>1</sup>, ZHOU Shilei<sup>1</sup>, LIU Mingyue<sup>2</sup>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China;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Promoting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tension of transfer-out households is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for strengthening and stabilizing the farmland rights, developing moderate & scale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Under the new employment form,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transfer-out households is severely challenged, which further affects whether they will continue to sign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s.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has not revealed the causal effect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stability of rur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the contract extension of farmland transfer-out households. [Methods] Based on the data of 516 farmland transfer-out households in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this study measured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rom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im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propor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atisfaction, and employed the IV-Heckman model and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stability of rur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the contract extension of farmland transfer-out households. [Results] (1) The averag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farmland transfer-out households was 3.016, 58.72% of the transfer-out households were willing to extend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s, and the average extension period was 3.752 years. (2) After overcoming the measurement error and the endogeneity issues caused by the reverse causa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as well as the sample selection issue caused by farmland transfer-out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extend contract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ransfer-out households' extension willingness and extension period.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robust. (3) Mechanism analysis showed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affects both extension willingness and extension period through the population adsorption effect and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and only affects extension willingness through the farmland transfer-out earnings expectatio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enterprises to create non-agricultural jobs, improving the skill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farmland transfer-out households, enhancing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c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chain of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tension.

**Key words:** new employment forms; transfer-out household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tension; IV-Heckman model;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Shaanxi Province; Gansu Province